

第五十一期

二〇一八年 ■ 春/夏季

香港研究：健康與生活

- ▲ 宏觀因素、社會信任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
- ▲ 香港中醫就診趨勢回顧
- ▲ 人生意義對華人長者生活質素的影響

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

「一帶一路」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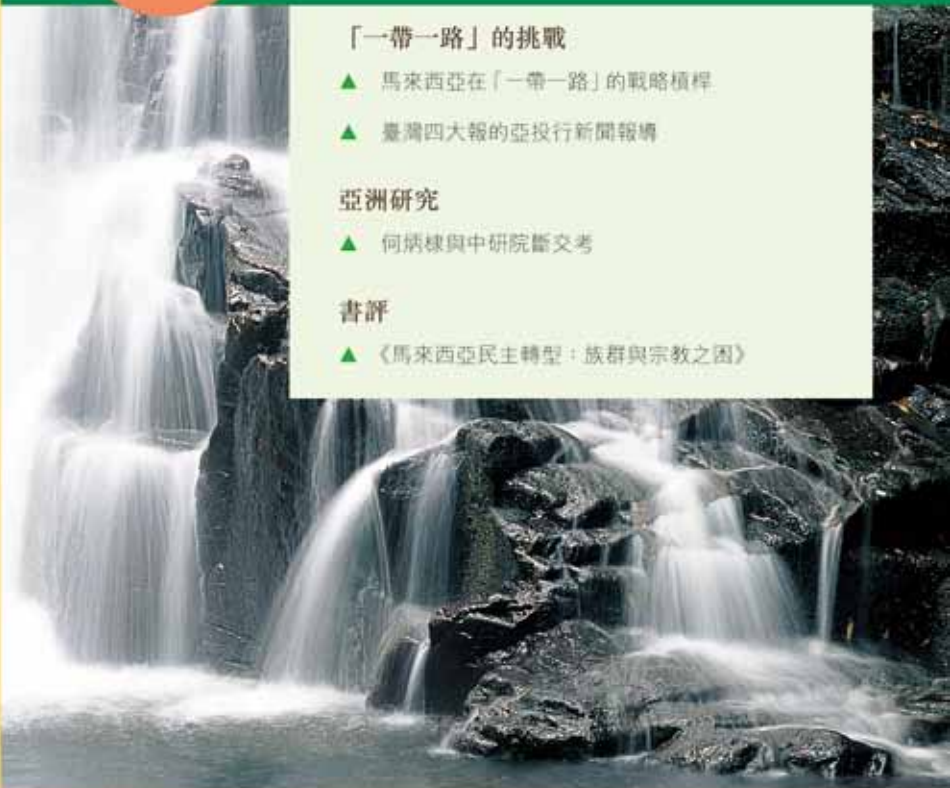
- ▲ 馬來西亞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槓桿
- ▲ 臺灣四大報的亞投行新聞報導

亞洲研究

- ▲ 何炳棟與中研院斷交考

書評

- ▲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敖恒宇 張宇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 / Summer 2018



大中華研究中心

Centre for Greater China Studies

何炳棣與中研院斷交考 兼論海外華人的 政治認同轉向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 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Summer 2018

The “Cold War” between Ho Ping Ti and Academia Sinica The changing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趙善軒 *

Gavin S. H. Chiu

摘要

本文根據臺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的一批未公開的史料，得知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院士於六、七十年代，由傾向臺灣當局面轉向支持中國大陸的經過，而遭受臺灣當局及中研院的敵視。面對當局的種種舉措，何炳棣卻不為所動，更以海外學人領袖的身份，大力推動中美建交，其先後多次返國訪問，受到鄧穎超、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接見。從此事得見，何氏及許多海外學人的愛國情懷及對強大祖國的盼

* 趙善軒 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是項研究是作者作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身份接受資助，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接納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望，促使他們由傾向臺灣當局轉向支持中國大陸。隨着八、九十年代臺灣的政局改變，加上中研院去政治化，何炳棣才與中研院的關係正常化。

關鍵字

中研院、中美關係、何炳棣、海外華人、臺灣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ocumentary, which searched for reasons to explain the depression between Prof Ho Ping Ti and Academia Sinica during 1967–1990. The answer was found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citizens who expected a strong regime to protect the motherland. Thus, Ho and most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shifted their allegiance from the Chinese Taipei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Keywords

Academia Sinica, China-U.S. relations, Ho Ping Ti, Overseas Chinese, Taiwan

一 前言

何炳棣（1917-2012），著名清華大學校友。於 1943 年獲取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赴美留學，當時他以 78.5 分取得第一名，比起日後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1922-）的分數還高。¹ 及後，何氏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英國史博士學位，畢業後前往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2 年

1 忻平（1997）：〈治史須重考據科學人文並重——南加利福尼亞州何炳棣教授訪問記〉，《史學理論研究》，第 3 期，頁 100。

獲臺灣教育部學術金質獎章，後於 1965 年榮任芝加哥大學湯普遜（James Wes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66 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組院士；1975 至 1976 年被公推為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乃該學會的首位亞裔會長，也是迄今唯一的華人會長；1975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L.L.D.；1978 年獲 Lawrence 大學名譽人文科學博士 L.H.D.；1979 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1988 年獲 Denison 大學名譽人文科學博士 L.H.D.；1987-1990 年間，任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傑出訪問教授；1997 年獲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² 何氏在社會史、人口史、經濟史、農業史、思想史、中華文明起源等重大課題上取得極大的成就，是上世紀最傑出的中國史學家，³ 他一改近代乾、嘉學派式或東方學為主的漢學研究傳統，是把中國史研究打進歐美社會科學殿堂的先驅。⁴

何炳棣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中，⁵ 透露他

2 〈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資料查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https://db1n.sinica.edu.tw/textdb/academicians/02.php?func=22&_op=? ID：H003，瀏覽日期，2017 年 3 月 1 日。

3 近年，至少有三篇學位論文專門討論何氏的學術成就，足見其影響力之大。參見林秀誠（2011）：《現代史學家何炳棣及其明清人口史社會史研究》，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濤（2013）：《何炳棣的史學成就及思想研究》，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張輝（2017）：《何炳棣的史學成就及史學特點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4 隨着 2017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何炳棣著作集》五種，包括《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中國會館史論》、《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除《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一書外，皆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可以預料，何氏的影響力將繼續擴大。

5 有關此書之內容評價，可參考單世聯（2005），〈一個人的戰鬥——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載《二十一世紀》，總第 88 期，2005 年 4 月，頁 139-145。

與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關係發生過種種波折，更曾一度中斷 22 年。⁶ 誠如雷戈所言：「他（何氏）回憶錄的整個文本都傳遞出一個信息，即他的回憶錄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真實性和歷史客觀性。」（雷戈，2016；頁 159）然而，書中並無詳細地交代其前因後果，甚至有所隱諱。筆者於臺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尚未刊的檔案中，發現一批極為珍貴而尚未有人使用的史料，檔案名為〈何炳棣、薛君度、龍繩文訪中國大陸〉，此檔案內附有數十份文件，大部分為手寫資料，目前只供在近史所內抄寫，不能影印和借閱。⁷ 本文嘗試對此檔案作出整理，並加上一些相關人物未公開的私人書信，以及各種名人回憶和當年中外報章的報導，再以考證和綜合方法，希望能為當代學術史填補空白。同時，本文希望透過闡述中研院的遭遇，達到以下目的。（1）了解 1970 年代前後被國際社會邊緣化下，臺灣當局及中研院所面對的反應；（2）本文以何炳棣為例，兼論部分海外華人的政治身份認同，是如何從臺灣當局紛紛轉向中國大陸。

《當代政治學十講》一書，對政治身份認同下了一般性的定義，其云：「個人成為某個社會集體之一員的從屬感。這種

6 中央研究院（下稱中研院）是臺灣的官方學術機構，而且一直承擔着臺灣當局的政治工作。在五、六十年代，中研院受外交部及美國駐臺領使的指令，多次在不同的國際學術組織，為臺灣當局爭取代表中國的權益，並在美國的支持下，其不只一次成功迫使中國大陸的代表退出相關組織。由此可見，當時的中研院並非一般的學術機構，它在國際上所受到的對待，也一定程度上反映臺灣當局的待遇。當臺灣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時，中研院便能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參加國際活動，相反，當臺灣受排擠之時，中研院只能使用其他名義參與活動。詳見〈國際科學史及科學哲學聯合會〉，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館藏號 11-36-03-02-074。

7 〈何炳棣、薛君度、龍繩文訪中國大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 11-07-02-04-02-372。

對社會集體或者社區的歸屬感，不一定需要強制的外力來確認或者是由法律來認可；群體歸屬感常常是很柔軟的、深藏內心深處的感覺。這種歸屬感既可能與生俱來，由每個個人的出身、成長經歷所決定，亦可與個人的自主選擇和自主行動有關。」(閻小駿，2016；頁 238) 本文同意上述觀點，並認為何炳棣與生俱來的個人性格固然左右了他的行為，其出身、成長經歷一定程度上影響他的決定，同時也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文將由這方面切入，試圖解釋他與中研院的關係。

二 新加坡事件的前因後果

據一份尚未曾公開的資料，即何炳棣於 1959 年寫給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1891-1962）的私人書信，他自言與院方的師友關係起自抗日時期，已有 21 年，⁸ 信中也表達二人關係是何等密切，⁹ 這主要因為何氏曾受胡適恩惠之故。¹⁰ 何氏在回憶錄中處處顯示，他是十分重視師恩之人，而他對中研院的感情，也與胡適有相當的關係。然而，何氏自從 1966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在兩年之後，即 1968 年 1 月後，他與

8 〈與那、呂、谷、何姓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 HS-NK01-204-。

9 何炳棣多年來屢受胡適的關愛，他們二人同屬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何氏赴美之時，胡氏已是成名學人，故他們一直以師生相稱，何氏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 Robert Livingston Schuyler 與胡適同為哥大校友，當何炳棣在哥大畢業，立即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上任，由於胡氏在中美均有極大的影響力，故 Schuyler 便寫信與胡適，託其為何炳棣在美國謀職。此後，胡適委託陳受頤代為關注。詳見〈與姓氏 S 開頭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檔案館藏，館藏號 HS-US01-010-001。

10 〈與陳受頤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檔案館藏，館藏號 HS-US01-010-011。

中研院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¹¹ 當何氏收到新加坡南洋大學的邀請受聘為該校歷史系的校外委員，他便前往新加坡，並於同年 2 月，接受原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共黨員的文物史學家單士元（1907-1988）之邀，於獅城的中華會館作學術演講。¹² 事後，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指摘他在新加坡發表言論重點有二：一、指孔子有教無類之精神即是共產黨思想；二、指科舉時代最低的社會「公道」，與南京國民政府當政 22 年期間，一黨獨攬和孔、宋的貪污盜國，適成一鮮明的對照。¹³

何炳棣在新加坡有兩場演講，第一場討論明清社會流動，在尾段曾批評南京時代的國民政府用人封閉；第二場講述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認為有教無類的主張和人本主義影響到毛澤東思想。¹⁴ 顯然，何氏不過是指出孔子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有一定的關聯關係，而非《中央日報》所指，說他認為兩者是同一關係。不久之後，臺灣背景的香港雜誌《新聞天地》，把何氏在新加坡事的言論，無中生有地描述成何炳棣在演講中猛烈抨擊臺灣當局。¹⁵ 對此，何炳棣極力否認，並指言論受到嚴重歪曲。¹⁶

11 其時胡適早已過世，不難想像，若然胡適仍然執掌中研院，而他又對何氏的行為加以勸說，往後的發展可能會不一樣。

12 何炳棣（2005）：《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頁 369。

13 陳三井（2016）：《迢迢密使路：穿梭兩岸密使群像》，臺北：獨立作家，頁 87。

14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2008）：《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67。

15 林博文（2013）：《關鍵民國：聆聽民國史的馬蹄聲》，臺北：大塊出版社，頁 236。

16 《王世杰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http://dbj.simica.edu.tw>：8080/handy/index，1968 年 3 月 16 日：「何炳棣昨有覆信來，謂政府所獲關於彼在星洲演說之報告為歪曲事實。」

本文認為，何炳棣的言論確實被過分誇大，他在演講中並無直接提及臺灣當局，其焦點不過是針對南京時期的國民政府，卻被中研院曲解為「痛詆中國國民黨」。¹⁷當然，以何氏敢言的性格，或許多少有些言外之音，但二者性質卻不宜一概而論。事後，有人向蔣介石（1887-1975）建議，應當除去何炳棣中研院院士之名，而蔣介石則認為此應屬中央研究院負責處理，並無明確表態。在中研院院長王世杰（1891-1981）大力反對下，除名之事也沒成事，而蔣介石亦沒有再作追究。¹⁸由此可見，身為憲法學家、教育學家的王世杰，對於學者極為尊重，也給予學者相當大的空間，盡量避免直接干預。¹⁹相對於國內學者而言，蔣介石對海外學人的態度也比較寬容。新加坡事件後，中研院並沒有如何炳棣回憶錄中所言，完全中斷了雙方的關係。第一，1969年10月，何炳棣仍然參與了中研院在北美的活動，並參與院長王世杰的聚會，²⁰其次，1971年，還與新任中研院院長錢思亮會面，而且中研院從無中止寄送刊物，可見《讀史閱世六十年》書中仍有不明不白之處，可從筆者發現的未公開檔案中加以補正。

17 《王世杰日記》，1968年3月7日：「中研院院士何炳棣在星加坡講演，痛詆中國國民黨，並謂孔子的『有教無類』即是共產黨思想。蔣先生昨日告知我，謂此事應由中研院負責處理。」

18 《王世杰日記》，1968年4月9日：「何炳棣言論案，余向蔣先生陳明，不宜作公開斥責，蔣先生允余所請。」

19 《王世杰日記》，1966年12月23日：「晨晤何炳棣院士。此為吾國在美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而有成績之壯年學人。日前張曉峰在某會議詆其左傾，似是誣詆，余當時聞之，頗為憤慨。」

20 《王世杰日記》，1969年10月8日午後三時：「與紐約及其附近諸院士開座談會，到會院士李書華、何廉、朱蘭成、袁家驊、何炳棣、楊聯陞、顧毓琇、楊忠道、劉占黿、王世濬、吳大猷等共十九人……晚在渝園 Lotus Eaters 聚餐，共三十餘人，劉鐸亦被邀參加。」

自新加坡事件後，中研院內有意見要把何炳棣定性為「左傾學人」。早在 1966 年底，即何氏獲中研院院士的同一年，院長王世杰已從歷史地理學者張其昀（1909-1985）口中得到消息，指何炳棣要求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研讀毛澤東（1893-1976）著作，²¹ 懷疑其思想左傾。何炳棣是中國古代史的教師，要求學生閱讀毛澤東著作似無教學上之必要。²² 事實上，何炳棣對毛澤東素有敬仰之心，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他曾為了毛澤東的文學水平與胡適作過一番爭論，何氏對毛的詩文甚是欣賞，胡氏卻不以為然，二人各不相讓，最後他迫使胡氏承認毛澤東至少是出色的散文家。²³ 再加上，何氏的博士論文是專攻英國土地史，長年接觸英國歷史文化，尤其是社會經濟理論，故何氏自言其對英國左派的費邊社會主義（Fabianism）有相當的認識，甚至有所傾慕。因此，他的意識形態大異於傾向資本主義的美國以及中國國民黨，反而對中國大陸的體制有相當的同情，²⁴ 這也是何氏與親美的臺灣當局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何氏的情況絕非個別例子，歐美的社會主義者一般也較同情近代中國的處境，自然較易影響到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包括負責處理新加坡事件的王世杰，他在英國留學時也曾加入費邊社（Fabian Society），²⁵ 無怪最初有人投訴何炳棣左傾之時，王世杰卻不以為然。

本文認為，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屬於溫和的左派思想，其重視經濟獨立和民主自由並重，而且主張以漸變方式推動社會

21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12 月 9 日。

22 〈何炳棣、薛君度、龍繩文訪中國大陸〉（下稱〈何檔〉），《芝加哥總領使館電報》（60），第 051 號。

23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320-1。

24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371。

25 陳慈玉等（2009），《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5。

改革，此與高舉馬列毛，主張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大相逕庭，故何氏自述的理由，並不能自圓其說。

三 何炳棣意欲擺脫院士之名

新加坡事件後，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已有專人關注何炳棣的一舉一動。1971年初，何氏把新著作交予加州大學，擬於當年的四月出版，內容是關於中華民族之起源及歷史演變。²⁶ 1971年2月18日，芝加哥總領使致函外交部，促請臺方在美人員，必須詳查此書對臺灣當局是否有害，若然有害，當局必須作出應對。實際上，此書討論的是中國上古史、考古學、人類學的學問，與當代政治全無關係。不過，藉此得見臺灣當局的行事，已到了捕風捉影的地步，如同驚弓之鳥。越是脆弱的政權，往往最害怕別人的批評，越是要想辦法妨礙他人的言論自由。當此之時，臺灣當局對於旅美學人的政治立場極之關切，卻又無可奈何，畢竟美國是出版、言論、學術自由的國家，留美學人的言行又不受臺灣約束，只要他們不返回臺灣，當局也是束手無策。

後來，鑒於芝加哥總領使要求查察何氏的新著作，意外地發現何氏返回加拿大渥太華申請前往中國大陸之簽證，此事令中國國民黨政權極為震驚。²⁷ 原來何炳棣曾於1948年7月

26 Ho Ping-Ti(1976), *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此書就是何氏在國際學術界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東方的搖籃》(1976)，但出版一事並不順利，後於1976年改由芝加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出版。

27 〈何檔〉，《芝加哥總領使館電報》(60)，第259號。

1日起於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供職，²⁸他早已入籍加拿大，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關係仍未進入正常化階段，此時他欲返回中國大陸訪問，便於1971年7月上旬，從芝加哥北上，前往1970年10月13日中加建交後新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渥太華的領事館，申請訪問中國大陸的簽證。²⁹此時，何氏已有了與臺灣以及中研院絕交的心理準備。據檔案披露，³⁰何氏曾宣稱，不在乎院士之榮譽，早有意欲「擺脫」，如是院方主動為之，結局則最是理想。何氏一向自視極高，曾為他編輯《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一書的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何漢威（2017；頁543-544）在〈後記〉指「何院士自承是個相當傲慢的歷史學家，史學界每以目空當世或目無餘子來形容他。」³¹再加上，何氏的學術地位早在歐美獲得肯定，既獲院士之名，又廣獲中外學人認可，故對於是否再維持此榮譽，他表示並不十分介意。據王世杰的說法，何氏曾於1971年向中研院新任院長提及「願辭中研院院士」。³²

同時，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使也關注到何炳棣與同屬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系教授鄒讜（1918-1999），兩人於1971年7月，即何氏自加歸美後，接受芝加哥第七道電視台訪問。鄒讜出自中國國民黨世家，他是國黨元老原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1885-1954）之子。鄒讜在節目中公開讚揚近年來中共治下建設之成果，而何炳棣則從歷史角度，討論中華民族之偉大貢

28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40。

29 〈何檔〉，《芝加哥總領事館電報》（60），第425號。

30 〈何檔〉，《芝加哥總領事館電報》（60），第259號。

31 何漢威：（2017）〈後記〉，載《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

32 《王世杰日記》，1972年2月6日：「美國人士亦以其言不實而有著論嚴斥者。余與錢思亮商量，以為院法無開除院士之條，但彼如自動表示願辭中研院院士（據錢院長云：彼去歲曾對錢院長有此口頭表示），則當提評議會，解除其院士名義。」

獻。後來，何氏回應電視訪問之事，對友人自言是熱誠之愛國人士，至於支持哪一政府以及其政治立場，當又是另一問題。對何氏而言，愛國與支持哪一個政黨，是互不衝突的事情。此涉及到何氏的政治身份認同，自何氏赴北美數年，中國政權易手，但他一直與臺灣保持良好關係，六十年代末期以前，從未有公開親共的舉措，亦未像其他海外學者般毅然回國參與建設，而是與中共保持距離。在新加坡事件後，卻出現明顯的轉變，此很大程度上是與臺灣媒體對他無理批判有關，也是國民黨意圖打擊學者言論自由而引起的反效果。事後，國民黨及中研院對他只作勸說，沒有加以籠絡，實無助於鞏固其身份認同，此消彼長，最終導致他在七十年代進一步與中共建立聯繫。

然而，總領使館向外交部的報告，強調節目在早上六時至七時播出，觀眾不多，影響實屬有限，不必過於擔憂。³³ 由此觀之，何炳棣早已成為臺灣當局的眼中釘，其言行與院士身份屢屢令當局極為尷尬，畢竟中研院院士是臺灣學術界最高的成就，偏偏何氏獲此名銜後，多次發表親共言論，而臺灣當局萬般無奈，只有對他進行監視，可是受制於美國的自由環境，卻又不能對學者的言行加以直接干預。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文件均提及何氏對友人之言，而友人之言寫入總領使館的報告，則反映何氏的身邊人時常向館方報告。

雖然何炳棣與中研院的關係甚深，但他對於中研院受政治擺佈的現況極為不滿，再加上他長年受到政治干擾，因此，何氏早已認為院士之名是其負累，對於除名，他是樂見其成。另一方面，也得見臺灣當局試圖控制學人的言論自由，卻又表現得

33 〈何檔〉，《芝加哥總領使館電報》（60），第425號。

力不從心。何氏已在美國獲得一定的成就，他已非當年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事業初起步之時，要借助院長胡適之力而謀安身立命的年輕人。此時此刻，中研院的影響力，也如同臺灣當局的國際地位，早已大不如前。

四 何炳棣率團訪問中國大陸

對臺灣而言，新加坡事件僅是針對南京國民政府而發的意見，當局最高層認為勉強可接受；芝加哥電視台事件則不過是同場的學者肯定中共的發展，而何炳棣並無明確表態，也無公開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未算觸及國民黨的底線。不久之後，即在何氏訪問大陸後，他多番發表親共言論，更建言美國應與中國大陸建交，此則涉及到政治效忠，性質與前兩件事大有不同。³⁴ 事件的詳細過程，何氏只在其回憶錄中輕輕帶過，而當中的細節更是隻字不提，慶幸中研院近史所藏檔案，可將此事還原。

1971年8月16日，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1907-1982）的報告，何炳棣於7月9日，曾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渥太華領事館申請簽證不果，期間與即將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智利大使、時任駐加拿大領事館的代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名外交家徐中夫（1916-）會談歷數小時。徐氏建議何氏且先往香港，再經香港的中國旅行社安排返國，原因是國家政策一向視海外學人為國民身份（或僑民），而非一般的外國公民，國民（僑民）則應從香港申請回鄉所需的證件，而香港的中國旅行社是中共在港的半官方機構，專門處理港澳及海外華人返國探訪事宜，中共對於何氏的申請視為回鄉

34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頁167。

探訪，非與一般加拿大公民入境看待。惟何氏對此頗有顧慮，聲稱自己持有加拿大國的護照，他一再要求以外國公民的身份訪問大陸，雙方一時之間未能達成共識，故會面未有結果。³⁵二人會談期間，徐中夫得悉何炳棣欲返大陸訪問的意圖，勸他如真心為中國大陸效力，則應留美從事宣傳工作，³⁶足見當此時中共對何氏仍然有相當的保留。

同時，事件已引起臺灣當局的高度關注，外交部責成中研院交出何炳棣的地址，欲把處理的層面升級，由外交人員直接聯繫，而院方表示近年與何氏缺乏聯繫，不知地址是否有變，而一直以來，寄予刊物的地址為 4741 South Woodlawn AVE.1 Chicago 60615, U.S.A。³⁷新加坡事件後，何炳棣與中研院少有來往，院方雖時有寄送刊物，何氏卻一直沒有回覆，所以院方無從得知其位址是否有變。中研院一直認為，對何氏制裁實非上策，應請與何氏關係密切之人士極力勸阻為宜，³⁸而此人正是原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跟何氏同屬南開中學、清華大學的傑出校友，也與何氏一樣取得中美庚款公費留學的化學家，中研院的新任院長錢思亮（1908-1983）。同年 10 月初，錢氏親函何氏再作道德勸說，信中代表中研院肯定何氏之愛國情操，但勸他應熱愛國民黨所代表的自由中國，而非中國大陸的共產中國。³⁹然而，何炳棣仍然堅定不移，對於臺灣方面的勸說不為所動，並堅決要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一看究竟。

35 〈何檔〉，行政院新聞局（60）景際甲字第 5437 號。

36 〈何檔〉，外交部致（60）北美司收文第 2629 號。

37 〈何檔〉，行政院新聞局（60）景際甲字第 5437 號；據 Google map 顯示，何氏的住處為兩層式的平房，住處離芝加哥大學僅十餘分鐘車程。

38 〈何檔〉，外交部致（60）北美司收文第 17182 號。

39 〈何檔〉，《錢思亮致何炳棣函》。

與此同時，何氏收到獲香港中國旅行社批出回鄉簽證的消息，便於 10 月初抵達香港，再返中國大陸，作為期四周之訪問，費用為港幣二千元，主要訪問學校、醫院、人民公社。計有廣州八天、杭州四天、蘇州一天、上海一天、北京四天，在北京到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拜訪了哲學史家馮友蘭（1895-1990）、物理學家（1902-1993）周培元；馮友蘭是何炳棣在三十年代清華大學時期的授課老師，兩人情誼匪淺。然而，團員要求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卻不果，而全程未有會見學生，校方稱學生多已下放，進行鬥、批、改工作，故不在校中，團員也不能從群眾的口中了解中國大陸的近況。除海外學人外，同行者 14 人當中，還有一些民國先賢的後人，情況令臺灣甚為難堪。團員計有馬里蘭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和何氏同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薛君度（1922-）、⁴⁰ 印第安那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嗣禹（1905-1988）、⁴¹ 匹芝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慶堃（1911-1999）、前民國駐法武官葉楠、⁴² 華盛頓聯邦學院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傅海瀾、⁴³ 華府燕京樓店東龍繩文（1926-1991）兄妹等人。⁴⁴

此團由徐中夫負責安排，眾人公推龍繩文為副團長，團長則為何炳棣，何、龍二人在行程中大罵臺灣當局及美國，並聲言醉心祖國，又表示甚為憂慮臺獨勢力的發展云云。全程由「華僑服務社」的人員陪同，實際上是進行監視，眾人均不能

40 薛君度，革命家黃興之女婿，是著名的革命史、外交史專家。

41 鄧嗣禹，燕京大學畢業，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費正清研究中國歷史，太平天國史、清史專家。

42 葉楠，又名葉北平，為國民黨元老葉楚傖（1887-1946）之子。

43 傅海瀾，滿清貴族傅涇波（1900-1988）之女。

44 兄妹二人為前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兒女，1949 年後，龍雲留在中國，累受政治運動之苦，其兩名子女則留美生活。

自由活動，時值文革，所有接見人士均絕口不談國內政治。事後，行程細節由薛君度向國民黨作秘密報告，報告內容細大無遺，可見薛氏雖返回大陸訪問，但其政治身份認同上仍是親近國民黨，他在團中扮演臺灣當局耳目的角色，此與何氏的敵視國民黨而全面擁抱共產黨的心態相映成趣。

及後，臺灣當局收到薛君度的報告後，作出檢討，並認為今後必須加強對海外學人的聯絡工作，方能挽回海外學人轉向投共的局面。政治人物和機構往往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論者，當時的臺灣當局也不例外，他們不會把國民的身份認同視作自由的選擇，也不會對於國民的政治轉向視作當權者失去人心的反響，而他們只「認為身份認同是一種政治工具。國家、政黨或者其他政治組織編織出一些身份，並將其作為組織和動員社會的工具手段來達致自己的社會、政治或者經濟目的。」(閻小駿，2016；頁240)此後，越來越多海外華人返大陸訪問，當中更有不少院士，事情完全朝着國民黨政權的相反方向發展，令到中研院的處境越來越尷尬。

何炳棣返美後，料想國民黨及中研院必定會再次派人干擾，竟長時間閉門謝客，後來不勝其煩，索性將家中電話線切斷，足見其決心之堅定。⁴⁵此段期間，他也不願與外界多談訪問之事，直至日後公開發言為止。同年12月8日，何炳棣在芝加哥召開記者會，翌日，據芝加哥媒體 *Daily New* 報導，其自言經歷了36天的訪問，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他表示，去國26年，是次返國，正值文化大革命，他認為文革已令中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公道之社會」，他更指全國人民受聘於國家下，推行公有制，舉國百姓飲食充足，再加上價格低廉，人

45 〈何檔〉，外交部致(60)北美司收文第17182號。

民精神充沛，交通配套完善，農業、輕工業發展良好，國家給予人民從生到死的照顧。⁴⁶ 何氏明顯是聽從徐中夫的建議，在美為國宣傳，而發言的內容也一再挑戰臺灣的底線。本文根據何炳棣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綜合為下列四點：

1. 無論是如何腐敗的政權，只要是反共，美國就會予以支持。矛頭直指臺灣蔣介石政權為獨裁者，並大力批判美國外交政策之短視。

2. 自中國來美的難民、傳教士、新聞報導皆指自 1949 年以來，被中共政權屠殺的人民有一千至二千萬，他認為此與事實不符，他指被中共屠殺的人民最多只有十數萬而已。⁴⁷

3. 中國參與韓戰、越戰，乃因彼為中國的鄰國，不得不參戰，此有別於美、蘇等軍事大國的軍事擴張，並一再質問聽眾若然加拿大一旦遭受侵略，美國又是否能夠坐視不理。

4. 他指中國人民熱烈期待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總統訪華，為中美兩國帶來新的局面。最後，他也承認中國仍然有些不足，如工人雖有尊嚴，但不能按意願從事喜歡的工作，並指出大部分國人仍未享受到足夠的自由等等。⁴⁸

事實上，197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歷史性訪華，是間接促使旅美學人回國訪問

46 “Prof find China ‘Most equal Society’ ,” *Chicago Daily New*, [Chicago], 9 December, 1971；本文認為，何氏得出上述觀點，也與他早年深受費邊社會主義影響有關。

47 “U of C Prof Lauds of Red China,” *Chicago Today*, [Chicago] ,9 December, 1971.

48 “Historian Tells Chinese Hope Nixon Visits”, *Chicago Sun Time*, [Chicago],10 December,1971.

的歷史契機，而美國總統尼克森也確定了將於 1972 年初破冰訪華，中美兩國建立了官方的溝通渠道，兩國的氣氛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同時，香港的大專生也發起「關心祖國，認識社會」的社會運動，紛紛組團北上，中國大陸也歡迎港澳居民回鄉考察，漸漸打開了海外華人經香港返國的大門。此前，國內對海外學人較有戒心，如上文所述，當何炳棣初次向徐中夫表示願意回國訪問，卻遭婉拒。在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⁴⁹ 西方對共產中國不懷好感，也會妨礙海外學人回國的動機。面對中共把國門對海外華人而開，臺灣當局除了監視、勸說之外，實在別無他法。然而，何氏等人回國訪問，時值文化大革命，所到之地皆受到專人的安排與監視，所見之人物皆不能暢所欲言，故此，也必影響到他們觀察的真實性。

五 「火紅年代」的何炳棣

此時，中研院對何炳棣的定性已由六十年代的「左傾學人」改為「投機分子」，認為「終究將不能得任何方面之信任」。⁵⁰ 在美國，也有論者對何炳棣的言論作出嚴正反駁，認為其言論多偏頗失實，此事對何氏在美國的聲譽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⁵¹

身為歷史學家，何炳棣把見聞結合歷史，發表了一次重要的演講，後寫成〈從歷史尺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色與成就〉

49 林滿紅（2008）：《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臺北：黎明文化，頁 57。

50 《王世杰日記》，1972 年 1 月 5 日：「上午赴中研院與錢思亮院長商議關於何炳棣院士媚匪言論事。余意中研院或我政府以暫不採取制裁手段為宜。此人為一投機分子，終究將不能得任何方面之信任。」

51 《華僑日報》（香港），1972 年 2 月 7 日。

一文，此文首發於香港的《七十年代》，後收入北京的《參考消息》，多年來被廣泛轉載。⁵²《七十年代》月刊，由左派背景的文化人李怡主編，它是香港以至海外華人認識中國的讀物，受到周恩來（1898-1976）的重視，也是中共領導人認識世界的重要刊物。⁵³六、七十年代，香港知識界受到保衛釣魚臺運動的啟發，許多知識分子對強大的中國有深切的渴望，便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漸漸形成關心祖國、認識社會的風氣，時稱「火紅年代」。⁵⁴《七十年代》月刊便在左派愛國陣營推動下應運而生，當中不乏著名文人、學者投稿，一度與立場親近新儒家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兼有強烈反共意識的《盤古》、《南北極》分庭抗禮。何炳棣投稿至此，足見他對《七十年代》的認同和信任。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訪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羅爾斯（案：政治學經典之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的作者），當代著名哲學家的立法標準。」⁵⁵又說：

52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393。

53 〈昔日人生大轉折——李怡〉，《蘋果日報》（香港），2017 年 1 月 9 日：「由於《七十年代》受到周恩來的看重，我在香港也被介紹認識了中共的高層。其中聯繫最多的是潘靜安，他的職銜是中國銀行的副總稽核……潘靜安是中共調查部駐港的負責人……但因為我常常向出版界的中共領導人藍真提供一些香港和海外知識份子的狀況，於是被直接介紹到潘公那裏。我所提供的，其實多轉述一些知識份子的來信，主要反映香港和海外知識份子圈中的思想動向，和一些在外國校園發生的涉及中國的事情。」

54 〈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載《中大學生報》，2012 年 7 月。

55 《七十年代》，總第 50 期，（1974 年 3 月），頁 4-14，下同。

從歷史的尺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憑藉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資、新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內，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稱為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

最後，何炳棣對西方資本主義作出深刻的反思，也對現代化理論進行批判，他說：

中國社會改革的種種成就，西方凡無政治偏見的人士都已承認。只是有些囿於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前景，不無疑問。誠然，中國目前的經濟成就，如與人類史上最富盛的美國和近十餘年西方盛稱的日本的經濟的奇跡相比，確實還有相當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進性的自然環境污染和最近證實的能源危機，已經引起西方較有遠見的人們開始懷疑西方經濟制度的優點，開始指出资本主義百餘年來恣情浪費世界資源的禍害，並開始批評以無限制的商品消費來刺激繁榮的種種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聲急呼，西方尊重物質享受的人生觀的不健全，應該恢復或追求比較健全的價值觀念。

按照何炳棣的思路，只要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路軌上發展下去，並堅持拒絕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就也可避免發生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以及成本上漲推動下導致的停滯性通貨膨

脹 (stagflation) 等問題，⁵⁶ 中國也因此走上與西方資本主義所不同的富強、平等、健康之路。今天看來，何氏之言頗有後現代主義的味道，但他卻不能預計到中國在數年後，即將推行改革開放，而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勢如破竹，進入了與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的軌跡，但何氏對國家的關懷並無隨着文革的落幕而終止，他利用香港作為幅射國內及海外華人的意見平台，多番在受到中共領導人重視的《七十年代》繼續發表〈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七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新因素〉、⁵⁷〈中國鋼鐵工業的現狀與展望〉、⁵⁸〈再論中國的石油問題〉等文章，⁵⁹ 後來《七十年代》改變編採方針，立場忽然由親共轉向親臺，何氏便停止向其投稿，乃轉移陣地，在另一本左派刊物《廣角鏡》積極撰稿，先後發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淺測〉、⁶⁰〈世界與中國煤炭工業的展望——附：中國能源政策商榷〉⁶¹ 等文章，可見何氏的投稿取向也與雜誌的政治傾向有一定的關係。同時，何氏又先後在香港理工學院（即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專上院校發表演說，⁶² 探討中國重工業的前景與展望。⁶³ 本文認為民族主義者

56 通貨膨脹 (stagflation)，即指經濟成長停滯，而物價卻節節上升的經濟現象，上世紀七十年代受石油危機所累，不少西方國家即陷入此中情況，也被新自由主義者批評是凱因斯主義發展經濟的後果。

57 《七十年代》，總第 61 期，(1975 年 2 月)，頁 6-14。

58 《七十年代》，總第 73 期，(1976 年 2 月)，頁 12-19。

59 《七十年代》，總第 97 期，(1978 年 2 月)，頁 68-77。

60 《廣角鏡》，第 84 期，(1979 年 9 月 16 日)，頁 4-5。

61 《廣角鏡》，第 94 期，(1980 年 7 月 16 日)，頁 14-21。

62 〈在理工學院禮堂何炳棣今天演講講題中國資源與經濟發展〉，《大公報》(香港)，1975 年 10 月 19 日。

63 當時留美的陳之嶽指出：「何炳棣於七、八十年代在海外知識分子中（特別是香港、台灣留美學生）的名聲如雷貫耳，原因是他經常在當時親北京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撰文歌頌中華人民共和國、吹捧中國的進步、

的身份認同，打敗了何氏的學者身份，身為歷史學家，他往往能忠誠和客觀地研究問題，一旦涉及民族意識，他又不忘加入主觀願望在其中，在上述的文章，雖然以實證主義的寫作手法包裝，但處處體現愛國主義的精神，當主觀願望戰勝理性思考，寫出許多令他自己也後悔的文章。恰如江宜樺所言：「（身份）認同一詞指的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個自我認識、自我肯定的過程涉及的不只是自我對一己的主觀了解，也滲雜了他人對此一主體之存在樣態是否有同樣或類似的認識。」（江宜樺，1997；頁96）何氏的言行雖然有他的個人因素，但也受到火紅年代思潮的影響，在那個狂熱的年代，許多人也對文化大革命表示高度的肯定。⁶⁴然而，一旦事過境遷，那種強烈的主觀意願也會隨之而改變。故此，在二十多年後，何氏在回憶錄中也發現這些文章只看到事情的表面，而看不到事情的真正動機，所以他希望「把這些文章忘掉」。⁶⁵

陳學然指出：「在經過1970年代的火紅年代後，香港的大學生經歷了林彪出逃、四人幫倒台的思想刺激，對中國的政治藍圖和美好憧憬徹底失望。」（陳學然，2014；頁293）不過，何炳棣並沒有像「認中關社」運動般退潮，反而走上更高更大的歷史舞台。文革結束後，何炳棣的立場急轉，他也不再

宣揚大陸鋼鐵、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料的產量將以倍數成長。在何氏的筆下，四人幫時代的中國、批林批孔時代的中國和毛澤東專制下的中國，處處充滿了希望與生機。親台灣的留學生不齒何炳棣的一面倒，親中共的留學生尊何炳棣為精神領袖。」陳之嶽（2012）：〈何炳棣天生桀傲，好勝而不服輸，曾痛罵黃仁宇、杜維明等學人——史學大師何炳棣傳奇〉，載《亞洲週刊》，第26卷25期，頁46。

64 陳新宇（2012）：〈人生何處不相逢——瞿同祖與何炳棣的命運對照〉，載《比較法研究》，第5期，頁139-140。

65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393。

公開談論反思消費主義、批判資本主義，也無再交代改變立場的原因，而是忽然高唱擁護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路線。1979年，何炳棣與兒子何可約（1948-），一同在北京獲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以高規格式接見。身為美加親共華人的領袖，何氏受到中共領導人青睞有加，此也可知中共高層對於海外學者的重視，也是中共高層借何炳棣而樹立開明形象的手段，此與國民黨被動、無奈的處境形成強烈對比。鄧小平在會談時對何炳棣說：「當前我們調整經濟計劃，主要是想把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借此機會，向海外華人傳達中國即將走上改革開放的訊息。之後，何炳棣公開對記者說：「我非常支持中國搞適合自己國情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想法。」⁶⁶

1971年，何炳棣與中研院的關係已陷入低潮，錢思亮曾與何炳棣談及院士身份的問題，何表示有意終止關係，而院方有些人希望何自動提出除名，但院方一直未有共識。⁶⁷ 1972年，即在何氏舉行記者會後，院方再次召開會議，其結論是「眾意以為此事如由中研院或政府採取任何公開的制裁或譴責性表示，徒使彼等（何氏等人）成為英雄，於國家或中研院，均為害多於利。」⁶⁸ 然而，海外學人回國訪問的大門已開，其中「院士者有何炳棣、楊振寧、任之恭、張捷遷、陳省身、林

66 〈昨在京會見何炳棣教授鄧小平談調整經濟目的是把我國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談話時強調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大公報》（香港），1979年4月18日。

67 《王世杰日記》，1972年2月6日。

68 《王世杰日記》，1972年4月12日：「晚應錢院長思亮之餐約，在其住宅商討院士何炳棣、楊振寧兩人，於自大陸回美後在美發表公開言論，為中共宣傳事……參加此餐會者，均為中研院評議員（閻振興、沈宗瀚、凌鴻勳、葉公超、陳雪屏、李榦、沈剛伯、鍾皎光等）。」

家翹、易家訓、李政道、王憲鍾等多人」，院方除了一再致函勸說，或派人拜訪試探，也無他法可為，可見國民黨在處理海外學人轉向的關節上，表現得軟弱無力。值得注意的是，錢思亮認為對於政治身份認同轉變的學者，只可作道德勸說，萬萬不可惡言相向，否則只會把他們推向中國大陸。他認為院士訪問大陸者，不少是思鄉心切，也有一些是出於好奇，若然對他們口誅筆伐，只會使更多海外學人反感，置中研院於更不利的處境。⁶⁹

六 七院士推動中美建交

1977年2月，「楊振寧、陳省身、牛滿江、張捷遷、任之恭、趙元任、何炳棣等七位院士」⁷⁰在美國《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要求美國總統盡快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認為應當「清除與匪勾結的『叛國院士』」，⁷¹《中央日報》的社論向來頗能代表國民黨高層的想法，除名之主張，似已獲得到高層授意。前院長王世杰本來在新加坡事件上對何炳棣採寬容態度，此刻也按捺不住，在日記指「錢院長優柔寡斷，迄今無公開反抗之表示，余極不以為然。」⁷²「往晤錢思亮院長，力責其對楊振寧、陳省身等背棄中華民國及中研院的言行，應公開表示譴責。思亮態度過於顧忌楊、陳等之反應，殊歉依違而不願公開評議會公開討論。」⁷³又「中研院近兩年來聲譽甚不佳，此其主要原因在院長不肯

69 中央研究院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頁169。

70 〈中研院「七院士」事件〉，《蘋果日報》，2014年07月08日。

71 同上。

72 《王世杰日記》，1977年5月10日。

73 《王世杰日記》，1977年5月5日。

糾正楊振寧、任之恭等之叛國，余曾屢次督責錢院長，均無效，言之慨然。」⁷⁴由此足見，王世杰、錢思亮二人對於除名一事有極大的分歧。然而，錢思亮以一人之力，對抗輿論及政界強大之壓力，更向蔣經國（1910-1988）力陳，要求對何炳棣等人除名一事暫緩處理，蔣經國也從善如流，終使除名之事作罷，⁷⁵此也見蔣經國處事開明的一面，也反映國民黨不致完全操控中研院的工作，使其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最後，中研院始終沒有對七院士發表公開譴責或聲明。⁷⁶上述種種，頗能反映錢氏事緩則圓的處世之道，也力保了中研院的學術名聲，令中研院不致完全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更為日後海外學人與臺灣重修學術關係留下了重要的伏線。

綜合上述討論，何炳棣是單方面對中研院中斷關係，院方雖多番討論開除其院士之名，但由始至終都按兵不動，至於外界傳言「香港《新聞天地》卻報導他抨擊台灣的國民政府，蔣介石即質問中研院院長王世杰，導致何氏和中研院斷絕二十二年，關係至物理學家李政道的兒子、芝大史學博士李中清力勸其老師何炳棣與中研院恢復關係，加上楊振寧曾於一九八六年訪台慶祝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八十大壽，何氏始於一九九零年赴台參加中研院第十九屆院士會議，與中研院恢復關係。」⁷⁷一般讀者不察，不知道由錢思亮領導下的中研院已經多番克制，他最終也沒有聽從前院長王世杰和其他人的意見而妄動。實情

74 《王世杰日記》，1978年9月9日。

75 《王世杰日記》，1977年11月9日。

76 〈蘋果樹下：何炳棣與中研院的一段糾葛〉，《蘋果日報》（香港），2014年3月31日。

77 陳之嶽（2012）：〈何炳棣天生桀傲，好勝而不服輸，曾痛罵黃仁宇、杜維明等學人——史學大師何炳棣傳奇〉，《亞洲週刊》，第26卷25期，頁46。

是，是何氏單方面中斷與院方的來往，不少人卻誤以為是院方受蔣介石之壓力而被迫中斷雙方的關係。

七 何炳棣與中研院恢復關係

隨着中美建交，何炳棣等海外學人與中國大陸的學術機構也建立起緊密的關係。及後，臺灣內部也起了巨大的變化，威權政治日趨淡化，並開放黨禁、報禁，加上兩岸關係逐漸緩和，「漢賊不並立，正邪不並存」的意識慢慢轉淡，⁷⁸ 中研院的政治色彩不再像威權時期的濃厚。1990年，何炳棣自言聽從其學生李中清（1952-）的建議，主動與中研院恢復關係。⁷⁹ 他退休後最重要的著作——《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聯經，1995）、《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中研院，2002）、

78 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頁113載，蔣介石自記：「今日革命基礎在臺灣之能否自力更生與強固不憾，而不在聯合國代表權之得失。故政府根本問題在確保臺灣主權，如果聯合國一經允許共匪朱毛偽政權加入，則我代表應毅然退出聯合國，以保持我國家民族（漢賊不並立正邪不並存）之人格，而況決無共匪參加之事，否則世無公理，人類必將滅絕矣。此對廷獻之指示也。」當時為1953年5月25日，國民黨遷臺不過數年，漢賊思維成為臺灣的指導思想，但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得到國際主流的承認，漢賊思維已不能有效地處理當前的問題，已有稍稍轉淡的趨向，如《王世杰日記》1977年11月9日載：「胡健中前日向余言，彼認為我對美宣傳，不可強調『漢賊不兩立』與『寧為玉碎，勿可瓦全』等語，應注意現實，採取較有彈性之政策，以便外交當局為有效之折衝。余意頗以彼所言為穩重。」此即為一例。

79 《讀史閱世六十年》，頁430；又參見「何公被正式聘為社科所的通訊研究員，當中有何公高足李中清的牽引。李中清與社科所歷史與思想組的研究人員有交情，加上何公的研究乃歷史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典範，正是社科所追求的目標，此事自然水到渠成。」見梁其姿，〈何炳棣先生晚年中研院的日子〉，《搜狐》，2017年1月20日，http://www.sohu.com/a/124854087_523159，瀏覽日期：2017年1月20日。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聯經, 2013)等, 也是在中研院出版, 亦曾多次在院中發表演說, 足見他對中研院是有深厚的感情, 畢竟以其學術地位, 把著作交到何處, 也定必受到重視, 他卻選擇在中研院發表, 反映了並未有受往事所困擾, 他晚年經常出席院士會議, 更積極發言, 其中一次對現時臺灣學者分工太過仔細的弊病加以抨擊, 他說:

因為我也深深覺得愈是專想搞原創性的東西, 那麼原創性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可是這個原創性本身, 要是出發點是以區隔主義做為基礎的時候, 而把學問分得非常的細, 則其原創性貢獻大的可能性就愈小……二、三十年代的清華跟現在不同即在於此, 它是立基於傳統之上而去創新。我在清華二年級的時候可以結合很多的東西, 但是現在以中研院這樣具有豐富資源的機構, 我反而覺得不能夠給我這種學習的機會……今天中央研究院一方面要再創新傳統, 若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已經受了現有區隔的影響, ……(中研院)不能夠太機械化的來衡量他們。因為真正的天才, 不用去管他, 他也會自己去做。因此, 我們的眼光應該稍微遠大一點, 不要走得太極端, 而讓人喘不過氣。⁸⁰

閻小駿指出:「基於身份認同而產生的社群歸屬感是在不斷分化組合中的, 在不同的情景下, 每個個人與不同的他

80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人文組會議記錄〉(2000), <https://db1n.sinica.edu.tw/textdb/academicians/dore/listm.php>, 瀏覽日期: 2017年3月1日。

者共用身份，結成有形或無形的群體。」(閻小駿，2016；頁239)從上述引文得知，何炳棣的身份認同之中，除了中國人的身份外，他常以清華學人自居，以清華大學畢業生為榮。此番在院士會議的閉門言論，頗能展現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博雅的氣度，也是對今天一些人文學科的學人，視野狹隘而不足讀史閱世者的當頭棒喝。⁸¹其實，在前述何氏寫給胡適的未公開書信中也有相似的見解。⁸²當時，他指出以史料學派為首的中研院史語所，在研究的方法上，沒有積極吸收西方新近的社會科學方法，未能展現博通的歷史學視野，也不算是真正的科學方法。⁸³總言之，何氏與中研院的關係歷時半世紀，不但與其師胡適在位時對中研院有所建言，在其晚年亦復如是，雖有中斷22年之久，一旦去了政治化，其對中研院學術發展關切

81 何氏晚年兩篇重要的文章也是在清華大學宣讀，其體現何氏一生致力於大題目的攻堅，李伯重，〈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中華讀書報》，2012年6月20日，作者回憶當時境況：「何先生在清華作了兩次學術報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另一次則是在歷史系的《夏商周斷代的方法問題》。何先生做講演之事在學校內外引起轟動，年輕學子們都抓緊這個機會，力圖一睹這位學術大師的風采。因此雖然何先生的講演極為專業，但是講演場所依然人滿為患，許多學生只能站在門外傾聽。在講演中，何先生雖然耳朵有些重聽，但是神采依舊，講起話來聲如洪鐘，觀點鮮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歲高齡。」

82 〈與那、呂、谷、何姓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NK01-204-，「何炳棣致胡適函」。

83 尚小明(2006)：〈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係〉，載《史學月刊》，第7期，頁87，作者認為：「早在史語所創立之初，便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學者，作為它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其實，史語所的西洋方法其實主要是「東方學」，而非新興的社會科學。何氏深受社會科學影響，講究世界視野，在學問上何氏與他在清華大學的老師、「東方學」出身的陳寅恪也不是特別親近，他更與史語所和北大的中國史為主的學風甚異。

之情，歷數十年不變。⁸⁴

八 總結

本文要處理的兩個問題：(1) 1970年代前後被國際社會邊緣化下，臺灣當局及中研院所面對的反應；(2) 本文兼又探討何炳棣和部分海外華人的政治身份認同，如何由親近臺灣當局紛紛轉向中國大陸。

就第一點而言，從上文討論可知，上世紀七十年前後，臺灣當局的國際地位已日落西山，不少原來政治認同上親近臺灣之海外學人，前仆後繼地返回中國大陸訪問，而何炳棣更是當中的先驅者。臺灣當局面對這種潮流，不論勸說、責難、除名等方法，其實際作用也相當有限，他們面對此挑戰而顯得無能為力，而臺灣當局聲稱要加強對海外學人的聯絡工作，也不見任何成效。臺灣仍有部分人堅持「漢賊不並立，正邪不並存」的指導思想，部分人認為凡是接觸中共者，必是國民黨之敵人（尤其是黨媒），此態度實在無助於鞏固海外學人對臺灣當局的政治認同，反而令更多海外學人產生不良的感覺，若非錢思亮以事急則緩、事緩則圓的手法處理，當局或會承受更嚴重的後果。

另一方面，中共對何炳棣等海外學人的統戰也取得相當的進展。七十年代起，何氏等人多次訪問大陸，在北京所見

84 1994年8月4日，何炳棣去信饒宗頤，討論關於1990年中研院19屆院士評選會議中，饒氏被投訴而被迫中止參選資格事件。對此，何氏表示：「（饒）兄似有欲向中院提出補償名譽之意。弟對此意具有無限同情，並願盡力支助。」可見何氏對於同行的名聲以及中研院院士選舉也是極為關心，也反映他願意積極介入中研院的工作。筆者從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鄭會欣先生口中得悉此信，特此銘謝，此信將收入沈建華：《饒宗頤先生與他的甲骨書札》（即將出版）一書。

之人物，不乏中共最高領導人（如鄧穎超、鄧小平等），這未嘗不可視之為中共對臺灣的挑戰，而且展現十分積極的態度。面對大批海外學人的政治轉向（尤其是中研院院士），對於正受到國際邊緣化的中國華民國而言，對島內的士氣造成打擊。不過，由始至終國民黨高層從未直接介入何炳棣一案，認為此事「應由中研院負責處理」。⁸⁵雖說是尊重中研院的學術自主，也反映兩蔣政權對於海外學人的言行有一定的包容，但從另一角度而言，代表他們對於拉攏海外學人的積極性不足，注定在這場海外學人的「爭奪戰」中敗陣。由始至終，臺灣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也沒有嘗試親自說服何炳棣等人，亦無派出黨內重量級元老對他直接勸說，只是透過學術界人士游說，可見臺灣拉攏海外學人的規格遠遠不如中共，國共雙方的手段也高下立見。

至於第二點，何炳棣與許多海外華人一樣，因政治變局而被迫去父母之邦，長年受思鄉之苦。他大半生也在北美謀生，種種原因使他遲遲未能返國，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據歷史學者汪榮祖所述：「何先生的個性和愛國情懷絕對是純真的。他兒子在電話裏告訴我，說他父親留下遺言，要求把自己和太太的骨灰運回浙江金華安葬。」（汪榮祖，2012）中國人素來重視鄉土情懷，何炳棣在天津出生，在北京學習，逾四分之三世紀的時間在北美生活，他卻選擇在金華安葬，由此可知，他對於祖籍的認同大於與他關係密切的地方，也反映他深受傳統鄉土文化的影響。1949年，中華民國失去大陸的統治權，絕大多數的北美華人都是從中國大陸出走，對於苦思家鄉的華人而言，接觸中共是返鄉探親的唯一出路。故此，何氏等人才

85 《王世杰日記》，1968年4月9日。

有組團訪問之舉，這是中國大陸在這場海外學人「爭奪戰」的有利因素，也是臺灣的先天不足。

如上所述，何炳棣之言行既有與他的出身、成長經歷等個人因素有關，⁸⁶ 同時也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那一代的華人見證了國家喪亂，長年寄人籬下，又不易融入當地社會，這些反而強化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論者指出：「需要注意的歷史事實是他們（何炳棣、楊振寧等西南聯學生）都是戰亂中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的，當時戰亂中的中國情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家連年戰亂，導致民不聊生，特別是下層社會極端貧困，這樣的歷史情景曾經刺激了當時還在學生時代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盼望中國統一、安定、強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當時中國所有知識分子內心的渴望。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對現政權產生反感，在思想深處普遍產生左傾萌芽。所以在去國二十多年後，看到國家統一成為基本事實，看到社會成員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和早年留在記憶中的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印象比較，西南聯大知識分子過於強烈的民族情感，讓他們很難再調動自己的知識和學養去理性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謝冰，2007；頁 150）上

86 例如他向來對於毛澤東也十分欣賞，而他在撰寫英國土地史博士論文期間，深受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影響，思想變得左傾，再加上他目睹六、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挫折，使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更加有寄望。另外，據何氏的回憶錄記述，他曾經與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當面爭辯，他以「經濟自由主張最為極端」來形容對方。詳見《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371-372。本文認為，相對於晚年的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當代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m）主張的放任主義而言，佛利民在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立場也不算十分進取，畢竟佛利民仍然贊同政府的干預行為是有必要性，而何氏卻認為當時的佛利民是極端經濟自由主張者。由此可見，何氏對於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本來就屬於十分保守。

述分析，也頗能套在何炳棣的個案之中，何氏一度希望文革能夠成功把中國帶往安定、平等、富強的方向，以擺脫他青年時對國家積弱的歷史印象，故他積極推動中美建交，又為國家探討能源發展的新方向，無非是一片丹心，為建設祖國而投入滿滿的主觀情緒。陳新宇（2012；頁 139-140）也指出：「即便閱歷豐富的歷史學家（何炳棣），思維縝密的物理學家（楊振寧），也不可能所有問題上都保持情感與理智的平衡，尤其在面對祖國時更是如此。當代學人包括鄙人在內因為歷史時空的不同，或許很難完全理解和真正感受那個積貧積弱年代中國學人內心深處波瀾起伏的家國情愫及同樣強烈的報國情懷了。」上述的個人經歷和歷史因素，左右了何氏等海外華人的判斷，當一切回歸平靜，熱情過去，他晚年對其為中共而寫的宣傳文章，也頗感後悔。

《明清社會史論》一書的譯者、明代史專家徐泓在〈譯者序〉也指出：「他（何氏）成長於抗日戰爭之中，有濃厚的民族意識，雖因工作關係入美國籍，但熱愛中國之心過於常人，曾質問一些華人學者：你是中國人怎可以不愛國？……1979年底，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大學（MIT）討論中美關係的會上，面對滿場洋人學者，親見何先生獨排眾議，大聲斥研究中國的洋人學者的反華情結。其敢言直言的態度在西方學界的華人學者中極為少見，一般華人學者在洋人屋簷下總是低頭，何先生決不示弱。」（徐泓，2013；頁 XY）許多海外華人不時受到歧視（至少他們有此感受），他們把自身的遭遇，投射在南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的歷史記憶之上，何炳棣也不例外。19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晉升核子軍事大國，並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儘管在內政上屢犯失誤而使國民陷入災難，但海外華人在沒有掌握充分的資訊下，對國家前途抱有強烈的幻想。故此，一些華人的政治認同遂由親近臺灣當局紛紛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相反，1970年代前後，蔣介石政權日漸被國際社會邊緣化，更退出了聯合國，何炳棣等人認為臺灣當局已不能有效地代表海外華人，也不能保護民族利益，他們反而對於正值文革的中國充滿憧憬，奢望毛澤東和四人幫能帶領國家強大起來，使其不再受洋人的氣。

本文討論的主角何炳棣，他的學術地位極高，又活躍於海外的愛國主義運動，獲親共之華人公推為領袖，他也因此被中共選中為統戰對象，向他極力拉攏，加上他的個人性格，雙方一拍即合。除此以外，1967年的新加坡事件，當時何氏的思想雖略為左傾，但尚未有明顯投共的行動，卻遭到國民黨的喉舌曲解其言論，將其推向中共的一方，又未嘗不是使其徹底擁抱中共的一大推力。

參考文獻

一、檔案

〈何炳棣、薛君度、龍繩文訪中國大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 11-07-02-04-02-372。

〈國際科學史及科學哲學聯合會〉，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館藏號 11-36-03-02-074。

〈與那、呂、谷、何姓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 HS-NK01-204。

〈與姓氏 S 開頭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檔案館藏，館藏號 HS-US01-010-001。

〈與陳受頤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胡適檔案館藏，館藏號 HS-US01-010-011。

《王世杰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

二、專著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2008）：《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博文（2013）：《關鍵民國：聆聽民國史的馬蹄聲》，臺北：大塊出版社。

林滿紅（2008）：《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臺北：黎明文化。

何炳棣（1995）：《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臺北：聯經出版社。

何炳棣（2002）：《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臺北：中央研究院。

何炳棣（2005）：《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

何炳棣（2013a）：《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何炳棣（2013b）：《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陳三井（2016）：《迢迢密使路：穿梭兩岸密使群像》，臺北：獨立作家。

陳慈玉等（2009）：《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

閻小駿（2016）：《當代政治學十講》，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Ho P.-T. (1976), *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三、論文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7年：頁83-121。

忻平（1997）：〈治史須重考據 科學人文並重——南加利福尼亞州何炳棣教授訪問記〉，《史學理論研究》，第3號，頁100-104。

何炳棣（1974）：〈從歷史尺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色與成就〉，《七十年代》，總第50期，3月號，頁4-14。

何炳棣（1975）：〈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七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新因素〉，《七十年代》，總第61期，2月號，頁6-14。

何炳棣（1976）：〈中國鋼鐵工業的現狀與展望〉，《七十年代》，總第73期，2月號，頁12-19。

- 何炳棣（1978）：〈再論中國的石油問題〉，《七十年代》，總第 97 期，2 月號，頁 68-77。
- 何炳棣（1979）：〈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淺測〉，《廣角鏡》，第 84 期，9 月號，頁 4-5。
- 何炳棣（1980）：〈世界與中國煤炭工業的展望——附：中國能源政策商榷〉，《廣角鏡》，第 94 期，7 月號，頁 14-21。
- 何漢威（2017）：〈後記〉，載《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頁 541-544。
- 尚小明（2006）：〈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係〉，《史學月刊》，7 月號，頁 80-87。
- 徐泓（2013）：〈譯者序：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會史論》〉，載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 單世聯（2005）：〈一個人的戰鬥——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二十一世紀》，總第 88 期，4 月號，頁 139-145。
- 雷戈（2016）：〈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對黃仁宇回憶錄和何炳棣回憶錄的史學史解釋〉，《天津社會科學》，頁 152-160。
- 謝詠（2007）：〈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開放時代》，11 月號，頁 150-158。

四、學位論文

- 林秀誠（2011）：《現代史學家何炳棣及其明清人口史社會史研究》，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輝（2017）：《何炳棣的史學成就及史學特點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 陳濤（2013）：《何炳棣的史學成就及思想研究》，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五、報刊資料

- 〈清華大學何炳棣等十八人受記過處分〉，《世界日報》，1936 年 12 月 28 日。
- 《華僑日報》（香港），1972 年 2 月 7 日。
- 《大公報》（香港），1974 年 8 月 6 日。
- 〈在理工學院禮堂何炳棣今天演講講題中國資源與經濟發展〉，《大公報》（香港），1975 年 10 月 19 日。

- 〈鄧穎超會見何炳棣夫婦〉，《大公報》（香港），1977年8月21日。
- 〈昨在京會見何炳棣教授鄧小平談調整經濟目的是把我國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談話時強調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大公報》（香港），1979年4月18日。
- 陳之嶽，〈何炳棣天生桀傲，好勝而不服輸，曾痛罵黃仁宇、杜維明等學人——史學大師何炳棣傳奇〉，《亞洲週刊》，第26卷25期，2012年6月24日，頁44-46。
- 〈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中大學生報》，2012年7月。
- 李伯重，〈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中華讀書報》，2012年6月20日。
- 汪榮祖，〈汪榮祖談何炳棣：不好相處的何炳棣先生〉，《中華讀書報》，2012年7月9日。
- 〈蘋果樹下：何炳棣與中研院的一段糾葛〉，《蘋果日報》（香港），2014年，3月31日。
- 〈中研院「七院士」事件〉，《蘋果日報》，2014年7月8日。
- 〈昔日人生大轉折——李怡〉，《蘋果日報》（香港），2017年1月9日。
- 〈何炳棣曾被清華記大過〉，《北京晨報》，2017年4月23日。
- “Prof find China ‘Most equal Society,’” *Chicago Daily New*, [Chicago] 9 December, 1971.
- “U of C Prof Lauds of Red China,” *Chicago Today*, [Chicago] 9 December, 1971.
- “Historian Tells Chinese Hope Nixon Visits,” *Chicago Sun Time*, [Chicago] 10 December, 1971.

六、網絡資料

-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人文組會議記錄〉（2000），<https://db1n.sinica.edu.tw/textdb/academicians/dore/listm.php>，瀏覽日期：2017年3月1日。
- 〈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資料查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https://db1n.sinica.edu.tw/textdb/academicians/02.php?func=22&_op=?ID:H003，瀏覽日期：2017年3月1日。
- 梁其姿，〈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搜狐》，http://www.sohu.com/a/124854087_523159，瀏覽日期：2017年1月20日。